

DOI: 10.13288/j.11-2166/r.2017.16.021

百 家 园

清帝康熙与传统医药

杨奕望^{*}, 胡蓉, 李明

(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,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, 201203)

摘要 清代康熙皇帝对于医药的关注并不限于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医学, 其对于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解、熟悉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总结其对传统医药的观点和主张共有 4 点, 即探本溯源、酌古准今, 疗效居先、晓谕广众, 药病相宜、饮食为重, 兼采蒙古、喇嘛医学。探讨康熙帝对于传统医药的看法, 对梳理中华文化脉络、传统医学传承而言具有积极意义。

关键词 康熙; 钦定格体全录; 西医东渐; 传统医药; 医学史

清代康熙皇帝(爱新觉罗·玄烨, 1654—1722) 喜好西学, 经耶稣会士张诚(Jean-François Gerbillon)、白晋(Joachim Bouvet)、巴多明(Dominique Parrenin) 等的侍读、讲解, 对西医兴趣浓厚, 对西药颇具见地。存世的传教士满文著作《钦定格体全录》《西洋药书》等客观反映了这段史实, 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^[1-4]。关注西医西药的同时, 康熙帝对待传统医药(包括中医药、民族医药等) 的态度如何? 有何观点与主张? 探讨这些问题, 尝试分析研究, 对中华文化及传统医学传承脉络的梳理具有积极意义。

1 探本溯源, 酌古准今

康熙帝对医药治病救人乃至影响国家社稷的思考尤为深入, 训曰“医药之系于人也大矣”^[190]。他反复阅读《黄帝内经》等中医经典著作, 并赞许有嘉, 曰“《黄帝素问》《内经》诸篇, 观其义蕴, 实有恻隐之心; 民生疾苦, 无不洞瞩”^[19]。为此, 康熙帝对历代医书之真伪甄别极其自信, 训曰“朕自幼所见医书颇多, 洞彻其原, 故后世托古人之名而作者, 必能辨也”^[119]。清初统治者稽古右文, 对于传世的中医药典籍也极力推崇。

康熙帝对医学理论领悟匪浅。如谈及“两尺脉属两肾”, 除明晰脏腑表里相配外, 还设问: “惟命门为虚寄, 或云属火, 或云属水, 总无确

说”^[109]。两尺脉何以分属两肾水火, 确为历代医家纷争的问题; 康熙帝采用朱熹以“贞固”二字解释北方水地、《左传》述上古水正之官员为修与熙二人治理这两种说法作依据, 医理上亦成一家之言。此外, 康熙帝精医通药亦为世人熟知, “清初六家”之一的查慎行曾感叹曰“上留心医理, 熟谙药性”^[10]。

“熟谙药性”绝非奉承之言。如草本野生植物“沙蓬米”, 康熙帝亲自品尝, 认为“性暖, 益脾胃, 易于消化。好吐者食之, 多有益”^[41]。又如“金光子”, 即酸枣仁, 康熙帝引地方志《闽书》与本草专著《政和本草图经》论述产地、来源, 并指出其形态、功效为“核圆而坚, 多窍, 人心之状, 圆外窍中, 故此果专为心家药”^[119]。对于药名、药效的疑问, 康熙帝更是敏学好问, 探本溯源。如对他咳嗽的肺胸舒丸中的药物金银香花, 康熙帝就曾提出质疑, “所说金银香花, 据查, 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并无此名, 有金银藤, 或是金银藤花吧”^[28]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), 内府发现弘治十八年(1505) 明政府组织编修、刘文泰主纂的《本草品汇精要》, 康熙帝遂命太医院吏目王道纯等重新绘录一部, 并从《本草纲目》等书内增补约四百九十条, 成为续集十卷^[14]。此举对于保存古代本草文献可谓贡献巨大。

2 疗效居先, 晓谕广众

研读医理同时, 康熙帝尤其看重治疗效果。如对进献金鸡纳霜(奎宁) 治愈他疟疾的西士洪若

基金项目: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(2015BLS003);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(10ZD063)

* 通讯作者: 13041627427@163.com, 13041627427

翰(Jean de Fontaney)等饱施恩赐,“特于皇城西安门内,赐广厦一所”^[11],但同样为他治疗疟疾的御医们虽日夜诊护,却因疗效不佳而深受重罚,“孙斯百等误诊朕病,强用人参,致朕烦躁甚病,……孙斯百、郑起鹄、罗性涵俱从宽免死,各责二十板,永不许行医”^[12]。这一事件绝不如传教士所宣扬之西方医药的胜利,而是在康熙帝心目中,疗效才至关重要。此外,对于行之有效的方药,康熙帝毫无保留地公昭天下以惠济百姓,“是故朕凡所试之药,与治人病愈之方,必晓谕广众。或各处所得之方,必告尔等共记者,惟冀有益于多人也”^[119]。康熙帝得“种痘之方”,大力推广“人痘接种”预防天花。

当然一味强调疗效的康熙帝也难免有以偏概全之时。如对于灸法,他就认为“灸病者非美事,而身亦徒受其苦。朕年少时尝灸病,厥后受方,即艾味亦恶闻矣,闻即头痛,徒灸无益”^[191],过分注重个人感受,对行之有效的灸法形成了误判。另一奏折批谕亦可见康熙帝对于针灸的态度,即康熙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,皇三子胤祉奏诏,意大利画师聂云龙(Giovanni Gherardini)右肩疼痛,已派遣御医凌易风、尹德诊视,二医力主针灸,但聂云龙拒不肯受,奏报皇上裁定,康熙朱批“西洋人既不欲针灸,则听其便,勿得强迫”^{[13] 331}。这体现了康熙帝对西来学者的关爱,及对待针灸似乎较为宽容、理性。

3 药病相宜,饮食为重

康熙帝主张方药与疾病相对应,用药贵乎与病证相适宜。训曰“药惟与病相投,……是故用药贵与病相宜也”^[120]。他训诲医家以前代贤医为典范,对症施治,认为“古人立方,各有定见,必先洞察病源,方可对症施治”^[190]。又以亲身经历反复告诫“又尝见药微如粟粒而力等大剂,此等非金石之酷烈,即草木之大毒。若或药投其症,服之可已,万一不投,不惟不能治病,而反受其害。其误人也,可胜言哉”^[190]。“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脾,宜于肺者不宜于肾。朕尝谕人勿服补药,……朕之调摄,惟饮食有节,起居有常,如是而已”^[14]。

康熙帝尊《灵枢经》所谓“五脏有大小、高下、坚脆,故饮食嗜好不齐”^[154]。反对滥补,视人参等补药为“趋奉迎合之小人”,认为饮食有节、温凉有度、起居有常才是养生之道。对此闻性真曾撰文《康熙的医学与养生之道》进行专门研究^[13],韦泽则从节、慎、劳、怡四个方面对《康

熙帝《庭训格言》的养生思想》展开分析^[14]。康熙帝曰“养生之道,饮食为重,……若或内伤,饮食者禁之犹可;至于他症,自当视其病由,从容调理,量进饮食,使气血增长”^[121],对内伤、外感的不同饮食要点训谕得十分清楚。

日常生活中,康熙帝盛夏暑月不开窗、不纳风凉^[9];在外出猎时,衣着厚实,预防寒冷^[154]。对于亲近大臣、股肱文武,康熙帝好为人医,每每赐以珍肴、灵药。如康熙帝近臣镶黄旗包衣赫世亨患寒暑伤气之证,发热烦躁,下痢红白,色如鱼脑,病势险大。康熙帝派遣御医张睿、刘声芳,经加减调中益气汤、加减小建中汤等治疗逐渐起色。康熙朱批“赫世亨今既已活,病得痊愈,则心勿烦闷,好生调养,必速康复。病才稍愈,若不调养,年已六旬,难保不犯。理气健脾丸之药,滋补脾胃,且能消食,每早一钱,用小米饭汤送服,想必有效,往御药房取之饮用看。除此之外,勿得饮用一切补药、人参等物。……燕肉在京城可得,此为彼所好者”^{[13] 528}。康熙帝对于脾胃健运、饮食调养、参茸补药的态度也由此可见一斑。

4 兼采蒙古、喇嘛医学

康熙帝不仅对传统中医药感同身受,对于外来药物、民族药材的使用也颇有心得。“药料之名,有中外声音相似者”^[56],康熙帝采用音韵训诂,对诃黎勒、菰荇子等来源进行考究,并采用实地考察法加以验证。“如蒙古有损伤骨节者,则以青色草名绰尔海之根,不令人见,采取食之,甚有益。朕令人试之诚然。验之,即内地之续断”^[120]。蒙古部落所见之青草绰尔海的根部(即续断),康熙帝派人尝试、检验,确有续折接骨之功效。

康熙帝十分信任蒙古医药,如正黄旗包衣护军参领莫尔洪暑湿伤气下痢,经刘声芳等久治不愈,康熙帝对御医颇为不满,亲自提出方案,以蒙古偏方治疗。“朕处侍卫迪纳亦系此病,曾经大夫医治,亦未见好。蒙古大夫使其服用兔脑,又用几味药调治,现已痊愈。故缮清药方所用药名,俟晚上送往供鱼房,即照此方试治”^[48]。此外,康熙帝对喇嘛医学同样重视,如“康熙四十四年七月,大阿哥福晋张佳氏育喜后忽然出血,病甚可危,皇三子胤祉谨奏皇上,康熙朱谕:应遣喇嘛诊视”^{[13] 385}。可见,在康熙帝的医药观念中,蒙古、喇嘛医学等民族医药均占有重要地位。

5 结语

综上所述,清帝康熙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

型君王,对于医药的关注并不限于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医学,对于传统医药学的理解、熟悉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。康熙帝讲求对证施治、药病相宜,且身体力行,饮食有节,温凉适度;同时医药化为怀柔绥抚的重要政治手段,以保障他所信任的家眷以及股肱大臣、文武官员的健康,其家长作风、医药和权力必然交织在一起^[17]。而御用医药实用性、权威性的特点,也造就了保守性、封闭性的弊端^[18],难以推动有广度和深度的医药现代化^[19]。

康熙帝曾经构想,“当兹海宇昇平,正宜怀保吾民跻春台而登寿域。尔等可取医林载籍,酌古准今,博采群言,折衷定论,勒成一书,以垂永久”^[20]。在后代《古今图书集成·医部全录》《医宗金鉴》终得以刊行。就如康熙帝谈到穴位“人中”时所言“今满洲呼‘呢呀尔马’,蒙古呼‘库门’,高丽呼‘萨拉密’,皆直曰人而已,……及阅《素问·骨穴篇注》有‘鼻’‘人’二字,是古人亦祇呼为人矣”^[21]。千般万态,返璞归一,回到中华传统文化之中,西学中源、满汉争议、汇通中西医药等问题,至少在康熙王朝得以暂时缓解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关雪玲. 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 [J]. 故宫博物院院刊, 2004(1): 99-111.
- [2] 董少新. 形神之间: 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: 448-460.
- [3] 潘吉星. 康熙帝与西洋科学 [J]. 自然科学史研究, 1984, 3(2): 177-188.
- [4] 韩琦.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[M]. 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 1999: 24.

(上接第 1425 页)

枢、太冲、足临泣、丰隆清热利湿,可见治疗时并未简单止痛,而是重视清热调腑在治疗中的作用,故收到良好的疗效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翟志超,刘金锋. 三叉神经痛治疗进展 [J].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, 2015, 21(9): 641-643.
- [2] 金兆春,刘芳,樊旭. 针药并举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临床疗效观察 [J].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5, 17(3): 92-93.
- [3] 徐笨人,葛书翰. 针刺治疗三叉神经痛 70 例疗效观察 [J]. 新医学, 1978, 4(3): 145.
- [4] 田丽芳. 针灸治疗三叉神经痛概况 [J]. 中医杂志, 2008, 49(2): 176-179.
- [5] 徐翔,李平. 针灸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50 例临床观察 [J].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, 2008, 3(10): 596-597.

- [6] 庭训格言 [M]. 查洪德,注译.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94.
- [7] 圣祖实录: 二 [M] // 清实录: 第五册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: 267.
- [8] 爱新觉罗·玄烨. 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 [M]. 李迪,译注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7.
- [9] 查慎行. 人海记 [M]. 北京: 北京古籍出版社, 1989: 123.
- [10] 陈可冀. 清宫医案研究 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1990.
- [11] 刘文泰. 本草品汇精要 [M]. 上海: 商务印书馆, 1956: 出版说明.
- [12] 樊国梁. 燕京开教略: 中篇 [M]. 北京: 救世堂, 1905: 41.
- [13] 清代起居注册: 康熙朝: 第四册 [M]. 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本影印本. 台北: 经联出版事业公司, 2009: 1985.
- [14]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.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6.
- [15] 圣祖实录: 三 [M] // 清实录: 第六册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: 302.
- [16] 闻性真. 康熙的医学与养生之道 [J]. 故宫博物院院刊, 1981(3): 3-11.
- [17] 韦泽. 康熙帝《庭训格言》的养生思想 [J]. 中华医史杂志, 2009, 39(6): 343-346.
- [18] 白雅诗. 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: 皇帝的网络与赞助 [J]. 董建中,译. 清史研究, 2014(1): 1-27.
- [19] 王扬宗. 康熙大帝与清代科学: 历史的曲折和启示 [J]. 光明日报, 2014-8-14(16).
- [20] 陈捷先. 康熙与医学: 兼论清初医学现代化 [M] // 张国刚,主编.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: 第二卷. 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0: 386-397.

(收稿日期: 2017-02-02; 修回日期: 2017-05-04)

编辑: 崔京艳

- [6] 黄卫. 针刺治疗三叉神经痛探微 [J].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, 2008, 22(2): 55.
- [7] 朱艳. 针刺配合电针及刺络拔罐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26 例 [J].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, 2011, 32(6): 68-69.
- [8] 逢冰. 远端取穴治疗三叉神经痛 [J].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, 2012, 35(6): 41-42.
- [9] 孙静青. 夏寿人“经穴反应”在三叉神经痛诊治中的应用 [J]. 中医杂志, 2015, 56(6): 522-523.
- [10] 李昌植. 针刺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32 例 [J]. 吉林中医药, 2012, 32(5): 524-525.
- [11] 郭爽,石学敏. 石学敏院士针刺治疗三叉神经痛经验浅析 [J]. 针灸临床杂志, 2014, 30(1): 48-49.
- [12] 赵万标. 镇静安神法加强针刺治疗三叉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[J]. 中国针灸, 2003, 23(10): 581-582.
- [13] 谢新才,孙悦. 贺普仁验案举隅 [J]. 北京中医药, 2012, 31(4): 247-249.

(收稿日期: 2016-08-22; 修回日期: 2017-05-25)

编辑: 侯建春